



从中国古代文学博士,到东欧文学译介者,再到政治社会问题研究者,学者景凯旋似乎没打算在一个领域呆上一辈子。用他的话说,自己读书求学,从没想过要成为一名“专家”,而是要回答自己内心的问题——安身立命,找到“我”的意义。

## 读书趁早才有意思

“我特别羡慕现在的年轻人,从小就能接触最好的书。”对比今昔,景凯旋有些感慨。从小学三年级开始,他就抱着长篇小说,甚至吃着饭都不愿意放下书。那时候,因为父亲爱看小说,他也借机阅读了大量革命历史小说,《红岩》《林海雪原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小城春秋》……小说里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十分吸引人,但在他生活的四川省阿坝州黑水县,他所拥有的阅读空间也不过“一条街的地方”,并没有多少书可读。

到了“文革”期间,更是无书可读。看到大量的书籍被封存、烧毁,景凯旋十分“心疼”。为了读书,有一次他偷偷约上一个小伙伴,半夜翻窗,爬到封书的地方,拣了一背篓书背回家。其中有古典文学《唐诗三百首》,也有鲁迅的《野草》。这些书,在那些被耽搁的青春时光里,成了他的精神食粮。

“阅读就像打开了一个世界。”景凯旋说,他

希望大家能趁早读书,尤其是在少年时代,记忆力好,对世界也怀有不同于成人的敏感。可惜的是现在的小孩受到应试教育的束缚,又被大量的信息淹没,就算资源丰富,也不一定能感受到阅读的快乐。他还是希望小孩子在阅读的初始阶段能读些“大书”,训练思维,培养对世界的感受力。在他看来,阅读能带来“心灵的扩大”。

“现在人们在聚会的时候,面对面,却各自拿着手机跟不在身边的人交流。我觉得很悲哀,这到底是心灵的扩大,还是缩小呢?”景凯旋认为,人对外部世界的感受,分为三个层次。“心灵”具有最高地位。能打动人,能与作者有精神上的交流和共鸣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其次是知识,学到知识,才能准确地理解和感受世界。再次才是信息,信息过载导致泥沙俱下,不少东西诸如流行词汇、新闻热点都是速朽的。与其在芜杂的信息上浪费时间,不如“回到书本”。

## 文学能有什么用?

回到书本,也是景凯旋在时代的变化中所做出的选择。动荡年代里,他经历了下乡回城,也目睹了家乡新华书店的门口又排起了长龙——只不过这次,书架上的革命宝典变成了中外名著,《战争与和平》《罪与罚》。1979年景凯旋考上了四川大学,后来又考入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。为了弥补十年读不到书的遗憾,他如饥似渴地泡在书店和图书馆里。一次,他看到一本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,破烂不堪,连封皮都没有,却毫不犹豫地掏出半个月的生活费买了下来。他喜欢待在图书馆里,和文学大师们进行“心灵交流”,享受孤独又充实的状态。他为卡夫卡《变形记》里主人公的悲惨遭遇感到“真切的难受”,欣赏乔伊斯讲故事不露痕迹的高超手法,赞叹索尔仁尼琴《伊凡·杰尼索维奇的一天》的真实感。在文学的世界里,他如痴如醉。

## 不做“两脚书橱”

景凯旋自己读书的兴趣也在不断发生变化。作为一名经受了严格学术训练的古代文学博士,在做考证的学术工作之余,他偶然读到了米兰·昆德拉的书。昆德拉的幽默和对正统意识形态的解构,有着巨大的批判力量。为了让中国读者看到和中国有着相同处境的文学世界是什么样子,景凯旋开始翻译昆德拉的小说。“我们看自己的文化,不仅要纵看,也要横比。在社会主义文化圈里,我们能看到相似性。”

后来,国内形成了一股“昆德拉热”,似乎人人都喜欢看昆德拉。“昆德拉表面上有一种犬儒主义,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,所以我们可以任意嘲笑。大家借着昆德拉,为自己的嘲讽作辩护。”这种误读,实际上贬低了昆德拉、克里玛等东欧作家的思想。因此,景凯旋有七八年的时间不想谈昆德拉,也不译他的书。

面对中国社会产生的问题,景凯旋认为寻找答案的最好方法就是从文学到文学,这是他译介东欧文学的初衷。改革开放后,大家可以安心地做学问了,而他内心的问题“还没有解决”。人活在世上,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什么?文学无法回答这个问题。

而在多年以后,当景凯旋成为一名大学教师走上讲台,面对刚走入大学校门的大一新生时,却看到了和当年的自己有着不同焦虑感的年轻人。在文学课的第一堂课上,一名学生直截了当地问景凯旋:“老师,我们大学四年学文学有什么用?”

学文学能有什么用?景凯旋被问得愣住了。后来他想,“好像确实也没什么用”。但随即又说:“精神的东西是‘无用’的,如果真要讲用处的话,可能在你一生的某个时间段,回忆起大学里的阅读时光,会对你产生一些作用,哪怕是安慰的作用。人总会遇到一些挫折,而文学给人一种幻想,它让你感受到人活着是有意义的。”

“当你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和阅读相结合时,你就会对文字有感觉。这种感觉,不一定出现在搞研究的学者身上,反而普通人会有,因为你读的书和你的人生有了关联。”

## 景凯旋: 阅读能带来 “心灵的扩大”

本报记者  
张文

2009年,因为一场要不要取消过圣诞节的争论,景凯旋给一家报社写了一篇社评,随后又开设了时评专栏。文学无法解释的社会问题,可以在政治、哲学、社会学领域寻找答案。于是,洛克、托克维尔、孟德斯鸠等政治思想家又进入了他的阅读视野。“我这一辈子的阅读,都是跟着自己的问题走的。”景凯旋说,自己不愿意只做一个“两脚书橱”,而是要带着问题,回答问题。

尽管自己好书,景凯旋却从不愿意劝人。“只要你想读书,就永远会有时间。”“就算没有本质的东西,人也可以快乐。”景凯旋半开玩笑半自嘲地说:“而读书搞文学的人,多半不快乐。”他讲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的一个故事。捷克转型成功后,剧作家哈维尔成为总统。布罗茨基给哈维尔写了一封公开信,希望哈维尔把捷克变成一个人都读书的社会。“这是作家和诗人的美好想象,实际上不现实。”

但是,人类还是要理想,有乌托邦,才会有大方向。追寻问题,不一定能找到答案。不过,“人类的阅读,就像在往地平线走,永远走不到,但世界却在扩大”。

“有时间,就去读最好的书。”景凯旋说。

《我们的中国》出版

李零:

“中国”的形成,  
关键是“两次大一统”

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历经十余年,在中国各地一边考察一边读书,遍访中国上古以来重要的城址、战场、祭祀遗迹等,在旅行日记和考察记的基础上,写成《我们的中国》一书并于近日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。



在写作《我们的中国》之前,李零用了近八年的时间,撰写了另一部大书《我们的经典》。他站在出土文献研究的前沿,为普通读者重新讲解《论语》《老子》《孙子兵法》和《周易》这四部名著。他说,这是现代人眼中“最能代表中国古代智慧的书”,也“比其他古书更能代表中国文化,更容易融入世界文化”。

从《我们的经典》到《我们的中国》,其中也有内在的关联。如果说前者是通过四部书来解说中国人的内心世界,那么后者则是从书斋走向了名山大川,面对一个更广阔、更现实的大地上的中国。

“我这四本书,主题当然是讲中国。如果我们深究一下,中国到底是一个地理概念,还是一个民族概念,还是一个文明概念,还是一个政区或者国家的概念?”在新书座谈会上,李零首先提了这样一个问题。《我们的中国》一共四册,分为“茫茫禹迹”、“周行天下”、“大地文章”、“思想地图”四编。从禹贡九州,讲到周秦大一统;从寻访孔子、秦始皇、汉武帝的足迹,到中国的山水形胜、岳镇海渎,兼及论述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地理问题。经由此书,中国自上古以来的人文和精神世界,有了一个大地上的维度。

《我们的中国》书中宏观的思考,基于大量具体的研究。占全书篇幅最大的,是李零去各地考察的笔记,或结合笔记所写的文章,像汾阴后土祠、雍州、滹沱河、中国的山川祭祀等。李零说,孔子曾周游列国,秦始皇分五次周游天下,“古代的帝王要想控制自己的天下,比较笨的办法就是必须像狮子巡行自己的领地一样,走遍大江南北”。而且古代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:飞机、火车、轮船。旅行,除了双脚,只有舟车,太不容易。2007年,李零分两次,一次山东,一次河南,追随孔子的足迹,到过孔子去过的所有地方,行程6000公里,寻访了24个县市,回来后写成6万余字的《大地上的〈论语〉》。

“研究地理,走路很重要。”李零在书中感慨,走路不仅对研究山水泽地重要,就是讲政区沿革,也一样重要。不过,这位学者的走路并不轻松,“不光看山水,看风景,更重要是看人类活动的痕迹。中国山水,人文背景很深,研究地理,离不开考古”。

“中国是一个文明漩涡。”李零说,中国作为文明漩涡,既有“中”对周边的吸引,也有周边对“中”的征服,随着周边不断地加入,与“中”融为一体。雪球越滚越大,造成“大一统”。“大一统”是古代的世界概念,中国叫“天下”。考古学家们对早期中国的形成已有许多争鸣,不同的学者依据各自的研究和发现,有二里岗“中国”、二里头“中国”、龙山“中国”、庙底沟“中国”之说,问题越追越远,背景的背后还有背景,似乎难有定论。李零认为,“中国”概念的形成,关键是“两次大一统”,第一次是西周封建,夏商周三分归一统;第二次是春秋战国纷争之后的秦汉大一统。

中国太大,内外矛盾丛生,自古已然。如何认识中国,对西方人、东方人都是一个难题。西周封建,文武之治,寄托了儒家的理想政治,基础是宗法制。李零解释,从西周盛世转为东周衰世,关键在于血缘关系罩不住地缘关系,地缘关系大发展,家和国已经分离,必须有另外一套管法。秦取代周,秦始皇要树立三个方面的大一统:制度大一统、学术大一统、宗教大一统。制度大一统,秦朝很见成效,两千年来自古有目共睹;而学术和宗教方面的大一统要等到汉武帝时才得以完成,汉武帝是接着秦始皇的事业来做。到王莽时,汉武帝确定的祭祀制度又被废除,官方宗教和百姓信仰完全分开,所以从东汉以来,中国的局面一直是:有国家的大一统,但没有宗教的大一统。这与西方正好相反。